

東協國家對亞歐會議態度之立場與策略

蔡東杰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作為當前最重要的跨區域主義 (trans-regionalism) 機制之一，亞歐會議自 1996 年正式成立以來，其運作便普受世人關注。為了強化作為近代工業革命發源地的歐洲，與當前全球成長最快速地區亞洲間的聯繫，亞歐領袖高峰會每兩年便輪流在歐洲與亞洲國家舉辦，至於其下的外長會議自 2001 年起更每年召開。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國家協會 (ASEAN) 不僅是該會議機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集體發言管道，更甚者，過去相當受矚目所謂「東協模式」的互動途徑，其實也被亞歐會議所遵循。在本文中，我們除針對亞歐會議的全球定位進行探討外，也會將焦點集中在東協國家身上，一方面既希望瞭解東協模式在該機制的運作情況，同時也期盼能釐清東協國家在該機制中的自我期許，以及它們目前所持的基本態度與策略究竟為何。

關鍵詞：東南亞國家協會、跨區域主義、亞歐會議、國際體系

壹、全球經濟板塊重組與區域發展

隨著工業革命運動與資本主義結構的不斷深化，至少從經濟面看來，全球體系的內涵在二十世紀可說有著巨大的變化。首先在世紀初，儘管美國的力量已經悄悄但迅速地積累起來，散佈全球的歐洲殖民力量似乎仍證明它們不僅仍然位居世界核心位置，更是全人類的主宰；不過，兩次大戰的爆發似乎徹底改變了這種

狀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雖因戰勝而登上超級霸權的寶座，但並未將歐洲推出舞台之外，只不過將全球核心從「歐洲」變成了「歐美」，換言之，前述發展或許只帶來核心區擴大的效果。無論如何，情況在世紀末又出現另一個關鍵性的重大變化，此即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發展。

從某個角度來看，此一變化的來源主要是由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運動對當前國際環境所帶來的「結構性衝擊」（structural impulse），至於其形式則是透過「超國家」（supranational）組織的發展來掌握分配資源的管道，並削弱傳統民族國家的控制與影響；（Melucci, 1966: 150）甚至使得民族國家機制的日趨凋零或許也不完全是種幻想而已。（Cable, 1996; Strange, 1996）事實上，就在全球化逐漸於1980年代引起學界注意的同時，各種「區域化」（regionalizing）浪潮與區域建制的討論也跟著甚囂塵上，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可說是歐盟（EU）的轉型與不斷擴張，至於東南亞國協（ASEAN）與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等建制的發展也攫取許多人的目光。進一步來說，正如某些學者所言，全球化運動與區域化浪潮其實是全球結構變遷中，同時並進的兩個過程。（Hettne, 1999; Bright and Geyer, 1987）其結果首先賦予當前區域主義若干新的內涵，例如相較於早期以內向性與建築壁壘為主的保護主義政策，新的區域主義則由於因應全球化下國際經貿互動加強的趨勢，在兼顧區域內整合目標的前提下，同時也重視與區域外環境建立連結關係。在這種「開放主義」指導下（Drysdale, 1991），非但不同區域間將積極透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來強化彼此的聯繫，甚至連發展程度不同的南北國家間也會藉此爭取合作機會。

對於「轉型理論」（transformationalism）的主張者而言，他們認為全球化乃是現階段重塑世界秩序的主要動力，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正被賦予一股遽變的力量（Giddens, 1996），儘管希望抵制這股浪潮的力量同時來自包括區域與全球的各個層面，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仍不斷衝擊著各國的既有邊界（Mittelman, 2000: 177），致使「區域體系」已逐漸取代「國家體系」，構成了今日世界的主要面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也由於西歐、北美與東亞（或亞太地區）等地方在深化區域運動中的領先態勢，而有將全球結構朝向三大板塊重組的傾向。儘管這三大板塊（Triad）佔當前國家總數不到20%，其對外貿易總額卻佔了全球85%以上，在金融資本與科技能力方面也居於顯著優勢，因此不僅其後續發展相當值得注意，因板塊互動衍生出來的現象也不容小覷。根據Hettne的看法，其實經濟板塊之間的互動可分成跨區域主義（trans-regionalism）、區域間主義（inter-regionalism）與多區域主義（multi-regionalism）等不同層次（Hettne, 2003）。¹首先，相較於跨區域主義僅涉及區域之間的廣泛交往與互動，區域間主義則暗示著此種互動的朝向制度化發展，至於多區域主義則暗示著未來區域體系將取代國家體系的可能性。

就目前三大板塊間的關係來說，儘管北美（美國）透過APEC與NATO而與

¹ 當然，學界目前對相關概念仍缺乏具共識性的定義，例如Christopher M. Dent對於跨區域主義與區域間主義的差異，看法便與Hettne正好相反。

東亞及西歐取得聯繫，但由於美國本身對雙邊途徑的偏好，使這些架構大體都還停留在跨區域的層次當中，至於亞歐會議則不啻是東亞與西歐為平衡美國霸權所發展出來的機制，²因為它可說是在當前重要的國際組織中，美國唯一沒有參加的一個，而這也讓亞歐會議有機會進入區域間主義層次。無論如何，區域意識的抬頭乃是今日相當顯著的一個全球性現象（WTO, 2000; Gilson, 2002）。至於在本文當中，我們首先將檢視所謂「亞歐會議」發展的背景及其經過，接著則設法將焦點集中在作為主要推動者之一的東協國家身上，瞭解它們對於該機制的想法與未來的展望。

貳、亞歐會議之源起及其發展

所謂「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的構想，首先是在1994年於新加坡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中被提出來，接著並成為該論壇在1995年會議中的討論焦點之一。時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認為，相較於歐洲與美洲(透過NATO)以及亞洲與美洲(透過APEC)間已經建立起聯繫管道，歐洲與亞洲間也應該催生類似的制度化機制來彌補這個缺憾。於是在獲得多邊共識的基礎上，第一屆亞歐會議於1996年在曼谷召開，³參與成員則包括東協7國、歐盟15國、歐盟執委會主席、中國、日本與南韓等，可說開啟了亞歐兩洲的經貿合作與國際對話管道，同時也象徵著兩大文明系統的結合，並提供一個降低「文明衝突」的機會。(Stokhof and van Velde, 1999)此屆會議除通過了確定「開放性區域主義」原則的共同宣言外，與會各國也決定一起追求並致力於加強亞歐關係，設置外交與經濟部長級會議作為溝通平台，同時創立「亞歐商業論壇」(每年一次)與「亞歐基金會」(設於新加坡)⁴，更甚者，它也使亞歐間由早期殖民階層關係變為實質的新夥伴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年首屆會議中瀰漫的樂觀主義氣氛，隨即因為東亞地區在1997年爆發金融風暴而蒙上陰影。在此情況下，不僅如何補救或解決危機很自然地成為1998年第二屆亞歐高峰會(於英國倫敦舉行)的主題，在前次會議中所出現的東西「平行對等」關係也似乎有所轉變。由於原本寄望東亞市場商機的歐盟，突然承擔了必須協助解決危機的責任，亞歐會議的發展方向因此也受到必須修正的質疑。(Islam, 1998)從此次會議中通過「提升貿易與投資行動方

²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ASEM只是其平衡美國霸權的設計之一，例如就在EU部長理事會於1995年通過支持建立ASEM同時，EU與南錫共同市場(Mercosur)也在同年簽署貿易協定；除此之外，歐洲也與北非國家簽署「歐洲-地中海夥伴關係」(EMP)，顯示其重建一個「歐洲式世界秩序」希望與企圖。Se Wallace (2002)。

³ 由於ASEM參與者僅限政府官方代表，排除民間機構的參與機會，因此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跨國研究中心(TNI)乃發起一項非官方的「人民亞歐會議」(People's ASEM)，並在第一屆會議舉行的前兩天同樣於曼谷召開，以彌補其議題的廣泛性。

⁴ 亞歐基金會(Asia-Europe Foundation, AEF)係根據1996年底ASEM資深官員會議(SOM)的決議，於1997年2月15日在新加坡成立，資本額為2160萬美元。

案」來看，歐盟雖然仍試圖提出解決東亞危機的構想，並接受亞歐關係需要更多考驗來增加磨合度的現實，但事實上它們並未真正提供具體的援助計畫，甚至還勸說東亞國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MF）所推動的改革做法；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態度當然會引起若干反感。更甚者，歐盟只顧著將重心轉移至中國大陸來躲避風險的做法，一方面既讓中國成為第二屆會議中的最大贏家，也使東南亞面臨被逐漸邊陲化的命運。儘管如此，此屆高峰會還是通過了設置「亞歐願景小組」（AEVG）的計畫，負責擬定下一個世紀的發展方向，同時也進一步肯定進行雙邊或多邊對話的重要性。（Synnott, 1999）

相對於前次籠罩在危機烏雲下的會議，2000 年在南韓漢城所召開的第三屆亞歐高峰會則以「新世紀繁榮和穩定的夥伴關係」為主題，希望能以更主動的方式為促進亞歐關係找到更務實的途徑。為此，一方面歐盟決定深化與東亞各國間的對話內容，⁵同時也推動建立「亞歐合作架構」（AECF），希望透過廣泛的綜合性計畫，主導亞歐間形成關於政治、經濟、貿易、文化與甚至是社會議題等多方面的共識性。值得注意的是，原先因共產集團瓦解而幾乎陷入孤立的北韓，在這次高峰會中意外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外交收穫，而中國顯然企圖進一步利用亞歐會議來鞏固其「後冷戰多極格局」的構想，至於印度則得到邀請在適當時機加入此機制的對話過程。

接著，亞歐會議在 2002 年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了第四屆高峰會。由於此次會議的背景乃因 2001 年 911 事件所掀起的全球反恐浪潮，因此如何面對恐怖主義也就自然成為這屆會議的主題之一。在會後發布的「主席聲明」中，特別強調未來的反恐行動應經由聯合國授權，並須合乎聯合國憲章規範（這點或許有針對美國而來的意味），此外，亞歐會議也強調應重視文化價值的多樣性。為落實前述一連串主張，會中也通過「國際合作反恐宣言」以及「國際打擊恐怖主義合作計畫」等相關文件。⁶

最後，在 2004 年於越南河內所舉辦的第五屆會議中，更一口氣接納 13 個新的對話成員（包括柬埔寨、寮國與緬甸等 3 個新 ASEAN 會員國與 10 個 EU 的準會員國），從而使會議參與國人口總數達到全球的 40%，而其 GDP 總值也超過全球 50% 以上。儘管因為英國質疑緬甸的參與資格（因其長期羈押反對黨領袖翁山蘇姬），使得 EU 與 ASEAN 兩大集團似乎有些劍拔弩張，最後這場爭議還是以和平落幕。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高峰會前的經濟與外交部長會議中，分別就如何促進雙邊投資以及加強政治對話等問題獲得共識，在共同配合全球反恐行動方面也獲致多數國家承諾，甚至還通過「高峰會主席聲明」、「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河內宣言」與「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等文件，⁷但因發展差異所引發對人權問題

⁵ 例如「人權與民主」議題首度被放進高峰會議程中，而政治方面討論也聚焦在武器管制、核子非擴散與南北韓問題上，並促進通過一個目的在解決朝鮮問題的「漢城宣言」，鼓勵 ASEM 成員積極與北韓互動來解決爭端，部份透露出有與美國相抗衡的意味。

⁶ 根據該計畫的規定，2003 年首先在中國召開反恐研討會，研擬相關磋商機制的建立，其次則在德國召開洗錢研討會，以加強金融與海空交通安全的合作關係。

⁷ 所謂「更緊密經濟夥伴關係」的目標是透過政策對話與協調，訊息與經驗交流，以及發展務實

的不同看法，還是凸顯出亞歐會議最關鍵的結構問題。

參、東協的參與及其基本政策方向

正如前述，東協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在推動亞歐會議的過程中，扮演著相當積極的促進角色。（Serradell, 1996: 185-186）事實上，早在東協於 1967 年正式成立後，即開始積極與歐洲間建立聯繫。例如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在 1972 年便成為東協特別協調委員會（SCCAN）的非正式對話夥伴，而這兩個經濟整合體也在 1975 年成立一個聯合研究小組（JSG），負責研究如何增進這兩個區域間的合作關係。接著，根據 1977 年的協議，EEC 和 ASEAN 不僅在 1978 年於布魯塞爾召開第一次部長級會議（ASEAN-EEC Ministerial Meeting, AEMM），更在 1980 年的第二次部長級會議中，簽訂「歐體與東協合作協定」，希望進一步增進雙方在商業、經濟與技術方面的合作。更甚者，在 1994 年的第十一屆 AEMM 會議中，雙方同意建立名人小組（EPG）與資深官員會議（SOM）來深化彼此間的廣泛聯繫。於此同時，由於歐盟各國在 1980 年代末與 90 年代初時，普遍面對諸如成長率低落、勞動生產率不振、企業利潤下滑與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困境，為挽救此種經濟衰退趨勢，歐盟於是在 1994 年公佈所謂「走向亞洲新戰略」（Toward a New Asia Strategy）指出，⁸ 歐盟各國領袖應將亞洲置於優先位置，並利用該區域的成長來保障歐洲於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先地位，為此，歐盟應積極與亞洲國家尋求政治對話管道，並協助其解決發展問題。總之，前述東協與歐盟間自 1970 年代以來的互動發展，雖可說是影響亞歐會議成形的重要歷史背景，⁹ 但若要进一步瞭解東協與歐洲間交往時所持的態度與政策，則還是得從觀察東協「區域意識」的發展著手才行。

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區域，東南亞的區域意識可說起源甚早，至於 1967 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則是其主要代表。¹⁰ 為避免重蹈先前東南亞公約組織失敗的覆轍（Daniel, 1982），從宗旨上看來，東協基本上是個經濟與文化性機構，儘管

項目等來推動區域間整合進程，至於合作領域則包括了貿易投資、金融合作與能源合作等三大部門。此外，所謂「文化與文明對話宣言」的重點則是，希望以彼此尊重為基礎來預防潛在衝突並促進互惠發展，同時重申文化多樣性的原則。

⁸ 事實上在 EU 公佈所謂「走向亞洲新戰略」前，德國在 1993 年中便決定展開「亞洲攻勢」並開始制定「亞洲外交藍圖」，而法國則在 1994 年初提出「法國在亞洲的主要行動」綱領，希望在 5 年內將法國對亞洲出口比重從 7% 提高至 10%，而英國也決定將與亞太間的經貿互動關係列為其國家發展的主要目標，至於包括西班牙、比利時、芬蘭、瑞典與挪威等國則紛紛召開亞洲研討會來探討「亞洲世紀」的問題，從而在歐洲形成一波「亞洲熱」。

⁹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亞洲新戰略乃是歐盟「亞洲熱」的產物，但東協並非其重點，例如在 1995 年 EU 便分別通過「歐洲與日本：未來階段」與「中歐關係的長期政策」等文件，顯示日本與中國才是其新戰略的主要對象，特別是中國，例如 EU 不僅在 1998 年通過「與中國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新政策並與中國舉辦首屆中歐高峰會，2001 年又通過新的「歐盟對中國策略」。

¹⁰ ASEAN 的區域意識前身包括 1954-77 年間，由美國主導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1961 年馬來亞、菲律賓與泰國共同發表的「曼谷宣言」與「東南亞協會」倡議，1963 年馬來亞、菲律賓與印尼發表的「馬尼拉宣言」與「馬菲印組織」倡議等，其中第一項僅為美國冷戰時期的戰略工具，後兩者則都因參與國間發生領土糾紛而告破局。

它並不排斥彼此間或與區域外國家進行軍事合作，但正如 1971 年的「吉隆坡宣言」中所言，當時的東協 5 國決定致力於尋求各國承認及尊重東南亞為一個和平自由的中立區域，以免除任何形式的外來干預。當然，除尋求中立外，思索如何透過彼此合作與集體議價途徑，因應全球化浪潮並共同促進區域經濟繁榮，也是東協努力的主要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般，東協國家也面臨著兩難困境，亦即它們既需透過區域整合途徑來共同強化競爭力，但卻又不自覺地抗拒整合以免失去自我主體性。例如在 1960-70 年代，東協國家一方面不斷強化組織成員間的關係，但對於範圍更大的「太平洋盆地共同體」(PBC) 構想則持保留態度。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東協成員多屬中小型國家，因此在大規模的整合運動中本即容易受到大國支配，為避免國家利益遭到忽視或犧牲，對類似倡議反應冷淡也是可理解的。

儘管如此，一方面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由於幅員過於狹小，因此若不積極投入全球運籌以爭取更大腹地的話，其未來發展勢必將遭遇一定瓶頸；再者，即便像原先作為擴大整合計畫主要反對者的馬來西亞等國，也由於 1980 年代後經濟的快速成長，需要更廣大國際市場支撐，而不再持全然抵制態度，甚至連馬來西亞總理 Mahathir 還在 1990 年提出「東亞經濟集團」(EAEG) 的想法。¹¹ 進一步來說，特別是從 1990 年代初的世界情勢看來，一方面美國正積極整合所謂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而歐盟也不斷試圖與東歐地區接觸，再加上中國大陸因為經改成功所展現出來的資金磁吸效應，換言之，包括拉丁美洲、東歐與中國這些東協國家主要的競爭對手，似乎都增加不少相對優勢。為對抗此壓力，東協國家首先在 1993 與 1994 年分別同意讓墨西哥與智利加入 APEC，藉此讓它也與拉美維持互動關係，接著在 1994 年中推動通過「建立東南亞共同體協議」，目標是將東協成員由 6 國增至 10 國，於此同時，東協除與中國展開對話外，¹² 更重要的還是藉由亞歐會議以引入歐洲的力量。

從某個角度來看，東協與歐盟間所存在的乃是種「彼此利用」的關係，亦即歐盟利用東協進入亞洲市場，而東協則利用前者作為制衡美國、中國，甚至全球化挑戰的經濟戰略工具。例如歐盟在 1996 年便提出一份「為歐盟與東協關係創造新動力」的文件，將其視為非常重要的政治對話夥伴，同時正如前述，這兩個區域間自 1978 年起便維繫著長期的正式對話管道，在 2005 年於雅加達所召開的第十五屆 AEMM 會議中，雙方除繼續經貿交流、共同反恐與統計合作等既定目標外，歐盟一方面重申剛通過的「與東南亞新夥伴關係」戰略，同時也透過挹注成立「東協生物多樣化中心」(ABC)，從而將合作範圍擴大到環保與生物議題等新的部門，顯見其雙邊關係正不斷深化的跡象。總之，東協國家的外交目標不外

¹¹ 根據東亞經濟集團的構想，其預定成員明顯將美加澳紐等國排除在外，只納入東協國家、中國大陸、日本、台灣、南韓與香港，但由於美國與澳洲強烈抵制，而日本也反應冷淡，於是馬來西亞在 1993 年改以「東亞經濟論壇」的鬆散想法代之。

¹² 東協在 1991 年與中國建立對話關係，並將後者設定為磋商夥伴國家；1993 年，雙方展開首度的經貿與科技互動對話；1996 年，中國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1997 年，首屆「10+1」正式召開，中國並與東協建立「面向 21 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

乎是透過靈活彈性的穿梭外交手段，以聯合集體的方式來投入國際事務，藉此彌補其區域發展劣勢，並確保區域內部的安全；(Simon, 1990) 至於亞歐會議則是其中的一個橋樑與跳板。

肆、亞歐會議與歐亞合作之未來

儘管有人認為亞歐會議的成效不彰 (Reiterer, 2002; Letta, 2002)，但因亞洲地區自 1996 年起，已取代美國成為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超過 3000 億美元以上，而同時東亞地區的外匯存底總額也超過 7000 億美元，這些都迫使歐盟與東亞間無論如何必須找出一個新的對話模式來；當然，歐盟對亞洲地區的高額入超現象 (例如在 2000 年便達到 1250 億歐元以上) 也是雙方得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最後，我們便針對過去 10 年以來的亞歐會議發展，分析其特徵與問題，同時藉此瞭解未來東協國家對此機制的看法。

根據前面已經舉辦過五屆會議的經驗，ASEM 大體擁有以下幾個特徵：首先是作為後冷戰時期，亞歐共同制衡美國霸權的工具，¹³這從亞歐會議乃美國唯一未參與之重要國際組織的現實可以看出。儘管在蘇聯集團崩解後，暫時幾乎沒有任何足以制衡美國的力量，不過根據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邏輯，出現像亞歐會議此種機制來對抗美國的單邊主義，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時也可刺激美國正面回應亞歐對於平等對待的要求。其次，亞歐會議也是目前少數的「跨區域主義」運動代表之一。事實上除亞歐會議外，「東亞 - 拉美論壇」(EALAF) 雖是另一個明顯具有跨區域意識的發展，但其代表性、影響力與未來性都很顯然無法跟前者相提並論；換言之，若想觀察區域體系概念在新世紀的後續發展，亞歐會議還是我們最需付出關切的案例。再者，我們也須注意所謂「東協模式」(ASEAN way) 在 ASEM 機制中的運用。(Garnaut, 1998; Low, 2000)¹⁴儘管此種鬆散型態確實使東協發展相當緩慢，但由於它顯然可為弱小成員提供尊重與保護，因此也讓整合進程不至於功敗垂成，這對於內部成員間異質性更甚於東協的亞歐會議來說，不啻也是種頗合適的一種互動途徑。

至於在亞歐會議發展迄今所遭遇的問題方面，首先，它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可說是歐盟與亞洲各國間發展程度與意識形態上所呈現的巨大差異，更不要說由於東亞國家在後殖民階段歷時尚短，因此如何在歐洲殘存的自大感與亞洲還在作祟的自卑感間取得平衡，便成為亞歐會議的第一個考驗。¹⁵其次，由於亞歐會議至

¹³ 特別是東亞國家，非但對美國動輒用人權、民主、智慧財產權、301 條款與開放市場進行威嚇相當不滿，也希望利用歐盟來降低其冷戰時期對美國的經貿依賴關係；至於歐洲國家也想改變在冷戰期間作為美國附庸的角色，甚至找回歷史光榮。

¹⁴ 相較於其他的區域整合機制，所謂「東協模式」既缺乏組織章程作為導引，也沒有設置任何具超國家性質的協調機制，對於運作規範也沒有完整的說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互相尊重、協商一致」為基礎的鬆散結合；其中，所謂「一致」並非意味著全體同意，而是只要「沒有反對意見」即可。

¹⁵ 有關「人權問題」的爭議也來自於此；相對於歐洲將人權紀錄作為歐盟入會，甚至要求作為加入亞歐會議的條件，亞洲國家的認知則有所不同。事實上，這是由於歐洲至今還沒有將是否採

今仍自我定位為「論壇」(forum)性質，這使它不但缺乏足夠的制度化(例如沒有常設秘書處的設置)，同時也大大削弱其決策能力。再者，特別是部份亞洲成員之間所存在的衝突問題，例如像日韓竹島爭議、中日釣魚台群島爭議與區域霸權爭奪戰、南海主權爭議以及中南半島毒品貿易問題等，再加上歐盟由於本身經濟問題，而開始對亞洲國家展開保護主義對抗等，¹⁶這些國際問題都會影響亞歐會議未來的發展性。

最後，回到東協國家對亞歐會議的態度上；從前述可知，面對似乎無可避免的全球化與區域化兩大浪潮，以及本身在面對新挑戰時所處的劣勢，既讓東協一方面必須投入包括東亞整合與亞歐對話等行動，但又必須審慎且彈性地拿捏發展分寸。從東協本身也存在相當多問題的角度來看，到目前為止，它在美國、歐盟與中國大陸的三角關係中，表現得可說還算是恰如其分。儘管如此，目前還是有幾個挑戰橫互在其面前：首先是其成員從 6 國擴張到 10 國後，所出現的重新凝聚問題，換言之，東協是否能像過去般大體意見一致可說大有問題；其次，面對在全球與東亞地區所出現的「中國熱」，儘管它已在 2004 年透過「中國 - 東協自貿協定」的簽署來對付，但是否能成功對抗黑洞效應還未可知；最後，其實從第二屆亞歐會議後，東協便從會議的積極參與者變成必須被解決的問題來源，這種角色弱化的發展也相當危險。總之，到底東協應如何面對其發展困境(包括亞歐會議在內)，乃是所有東亞研究者所應繼續進行觀察的。

取自由民主視為文化多樣性問題的緣故。

¹⁶ 例如歐盟自 1999 年起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陸續課以懲罰性的反傾銷稅等保護主義政策，都是明顯的例證。

參考文獻

- Bright, Charles and Michael Geyer(1987), “For a Unified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9, 71.
- Cable, Vincent (1996) , *The World's New Fissures: Identities in Crisis*, London: Demos Press.
- Daniel, Francis (1982) , “ASEAN Acting Steadily but Quietly to Increas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30, 4.
- Drysdale, Peter(1991) , “Open Regionalism: A Key to East Asia’s Economic Future,” *Pacific Economic Paper*, No.197,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 Garnaut, Robert (1998) , “ASEAN and the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4:3, 89-102.
- Giddens, Anthony (1996) , “Globalization: a Keynote Address,” *UNRISD News*, 15, 11-22.
- Gilson, J. (2002) , *Asia meets Europe: Inter-regionalism and Asia-Europe Meeting*. Cheltenham: Edwin Elgar.
- Hettne, Bjorn (1999) ,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ettne, Andras Sapir,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 Hettne, Bjorn (2003) , “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The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 Council on Comparative Studies, American University.
- Islam, Shada (1998) , “Spotlight: On the other Foot,”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161:16, 68.
- Letta, Corrado G.M. (2002) , *ASEM's Future*, Bolongna: Lo Scarabeo Editrice.
- Low, L. (2000) , “ASEAN as a Model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or the Art of Muddling Through?” NUS Research Paper RPS No.2000-039.
- Melucci, Alberto (1966) ,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telman, Jim(2000) ,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iterer, Michael (2002) , *Asia-Europe, Do They Meet?* Singapore: Asia-Europe Foundation.
- Serradell, Victor Pou (1996) ,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SEM) :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2, 185-210.
- Simon, Sheldon W.(1990) , “ASEAN’s Security in the 1990s,” in Alison Broinowski,

- ed. *ASEAN into the 1990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12-137.
- Synnott, Hilary (1999) , “The Second Asia-Europe Summit and the ASEM Process,” *Asian Affairs*, 30:1, 3-10.
- Stokhof, Wim and Paul van Velde, eds. (1999) , *The Asia-Europe Meeting: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 Strange, Susan (1996) ,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ace, William (2002) , “Living with the Hegemon: European Dilemmas,” in Eric Hersberg and Kevin Moore, eds. *Critical Views of September 1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95-108.
- WTO (2000) , *Mapping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udy for ASEAN policy and Strategy to ASEM

Tsai, Tung-Chieh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CHU)

Abstract

To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ns-regionalism regimes, since 1996, the Asia-Europe Meetings (ASEM) has begun to attract notice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urope which was the origi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sia which owns the most rapid growth, the ASEM Summit has been hold every two years in Europe and Asia by turns, and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also been hold once a year. More importantly,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 is not only one of crucial participants of ASEM, the so-called “ASEAN Way” also offers the main dialogue approach to the latter. In this paper, we will observe the global position of ASEM firstly, then focus on the policy and strategy for ASEAN to deal with its relations with ASEM.

Keywords: ASEAN, trans-regionalism, ASEM, international system